



院書麓嶽

书院学丛书

中国书院文献研究

邓洪波等 编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院書館藏

书院学丛书

中国书院文献研究

邓洪波等 编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B036)

湖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传统目录学视野下的中国书院文献研究”(16ZDB22)

湖南大学出版社图书出版基金资助

书院学丛书

中国书院文献研究

邓洪波等 编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长沙

“书院学丛书”编委会

主 任

邓洪波

成 员

王胜军 兰 军 陈时龙 徐 勇 徐雁平

张劲松 杨代春 刘 明 刘艳伟 肖永明

鲁小俊 顾宏义 谢 丰 吴国武 李晓宇

龚抗云

本册作者

邓洪波 宗 尧 方彦寿 王胜军 王 帅

丁 利 王丹丹 兰 军 刘艳伟 刘 金

李 江 陈时龙 肖 啸 吴东泽 陈佳莉

张 峰 赵 伟 徐雁平 黄冠华 鲁小俊

谢川岭

序 一

杨忠

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影响最大的教育文化机构。邓洪波教授认为书院是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所谓独特，我以为大概是因为它既非官学，亦非纯粹的私学，但又与官府、官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直得到各级官府的支持和资助。例如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阮元创诂经精舍、学海堂，张之洞建尊经书院、广雅书院，都是任官期间的事。许多官员也将创建书院、讲研义理学问视为一种可以引以为豪的政绩，希望以书院长育人才、开启民智、移风易俗。比如汤显祖贬徐闻典史时创立贵生书院，亲往讲学；任遂昌知县时，建相圃书院，拨寺庙道观部分食田归书院收租，以作修葺房屋之费及诸生膏火之助。他自己亦在书院中“与诸生讲德问字”“陈说天性大义”而不疲。但书院又非官学，书院的科目设置、讲论内容都由著名学者担任的书院山长、主讲设定与主持，官府干涉有限。书院与官学既相区别又有联系，故清末废科举、改书院为学堂，使中国教育由古代迈入现代，便能自然衔接而水到渠成了。

书院与私学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春秋以降，学在王官渐变为学在四夷，私人讲学之风渐盛。孔子的讲学活动，既有与弟子讲论六艺、切磋琢磨的谨严与认真，亦有“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散淡与闲适，与书院自由讲学的精神一脉相通。两汉经师讲学，受业者不远千里而至，讲读之所则“讲堂”“精舍”随意立名。马融“教养诸生常有千数”，设绛纱帐讲学，“前授生徒，后列女乐”，是最气派的一家。魏晋南北朝战乱频仍，但讲学之风不息。上述讲学活动和组织形式，对后来书院的出现有着深刻影响。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东西二都设立的丽正书院和集贤殿书院，有着国家藏书、校书、修书及由此而辨章学术的深厚传统，这标志着书院之名得到官方认可和提倡。其实，最先出现的还是民间书院，有唐代文献与地方史志为证。《全唐诗》中也提到过13所作为士大夫私人

读书治学之所的书院。也就是说，书院源出于唐代私人治学的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是官、民两股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大唐五代之际，开始出现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江西的桂岩、东佳与燕山窦氏皆是其佼佼者。而书院的大繁荣则要进入到宋代，著名的“濂、洛、关、闽”四家，既是学派，也是讲学团体，且师生传承，历久不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参与过书院的创建和讲学活动，通德鸿儒，发幽阐微，风雅相续，辉映坛席。元代书院数百所，明清书院各数千所，是书院的鼎盛时期。

书院讲求敦励品节、探研经义，以求知行合一，长育人才。主持者往往以自身风范声望言传身教，并不刻意传授系统知识。尤其是宋代书院批判继承了两汉的讲经之风，注重阐释以“四书”为中心的儒家经典义理，理学借书院讲学得以光大。此后，随着时代的需要和地方学术风气的浸润，书院讲学内容各有侧重，或义理、或实学、或训诂、或辞章，而书院的教学方式也不拘一格，讲论、问答、辩说、切磋，形式多样，效果显著，颇有百花齐放之势。当然，书院的根本任务是养育人才，故与唐宋元明清各代科举密切相关，讲论经义、草拟试策、熟记帖括、习练论说，自然也是书院学习的重要内容。一些著名学者掌教书院，往往能形成学派，光大学术，引领学风。不同学派学者在书院的论辩驳难，也使书院成为交流学术、推广宣传学派主张的方便场所。书院促进了学术的发展，仅以清代为例，著名学者如黄宗羲、汤斌、张伯行、杭世骏、齐召南、全祖望、姚鼐、卢文弨、王鸣盛、程瑶田、钱大昕、章学诚、洪亮吉、孙星衍、阮元、陈寿祺、顾广圻、陈澧、刘熙载、俞樾、张之洞、王先谦、缪荃孙、皮锡瑞等，这些在清代学术史上闪耀的群星，无一不在书院任过山长或主讲，将他们在书院讲学的学术贡献稍作整理，便能勾勒出清代学术史的梗概。可以说唐宋以来中国古代教育、文化、学术的发展实有赖于书院的繁荣，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乾嘉汉学、晚清新学的产生与兴盛，都与书院密切相关。书院以及乡村的义塾、义学，使中国儒学传承的血脉贯通而达至社会底层，从而也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有了最坚实的社会基础。中国文化绵延不绝，书院有其莫大贡献。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化教育组织，深深影响着唐宋以来教育、文化、学术的发展，近百年来学者往往将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比照考察，研究书院的论著，颇为可观。特别是近十数年来，书院研究

更有日渐兴盛之势。许多研究已涉及书院的各个方面，如书院制度及其组织形式，书院的课程设置、讲会制度和开讲仪式，书院的学规章程和管理模式，书院的经济活动和经费开支，书院的藏书与刻书活动等，涉及面虽广，但研究似乎尚不够深入全面。究其原因，自然与目前学术界所见书院文献资料并不丰富有关。例如，仅清代书院即有5000所，而迄今许多论著所涉书院仅百余所，眼界和格局便受局限。大量书院文献散藏各处，许多文献甚至不为人知或少人问津，研究自然不够全面，也难以深入。材料的缺失严重阻滞了书院研究的进程，因此，比较齐全地搜集目前存世的书院文献，分门别类地加以影印或点校出版，对于书院研究而言，事莫大于此，更莫急于此。现在邓洪波教授主持的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工程即将出版几种专题丛书，使此大事急事终获成功，必将为中国书院研究的繁盛带来新局面。

邓洪波教授及其团队的成果，对于书院研究及与书院相关的研究，至少有三大贡献：

其一，为书院研究提供了相当完备的资料。他们编纂了比较完善的书院文献总目及总目提要，第一次揭示了现存书院文献的全貌，在此基础上又将现存近1500种书院文献中的1000余种影印出版，成《中国书院文献丛刊》，进而又择其中尤为重要者约150种点校出版，成《中国书院文献荟要》。学者研究实践证明，书院研究赖以深入和发展的基础是书院文献的全面搜求与系统整理，邓洪波教授的团队完成了这项工作。他们的书院总目及有选择地影印、点校的占总量七成的书院文献，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也为一般读者了解中国书院指出了门径。大量过去未被发掘、利用，而又相对完备、系统的资料，经他们网罗放失，搜剔丛残，使遗编剩稿，显晦并出，吉光片羽，终免湮没，而流风余韵亦可相因而不坠。相信今后的书院研究一定会有许多新发现、新视角和新课题，也必将产生许多更近于史实的新结论。

其二，整理与研究高度融合，产生了系列成果。他们的工作使《中国书院文献丛刊》《中国书院文献荟要》与其他研究论著等互相呼应，是将整理和研究结合得比较好的范例，也为古籍整理与研究如何互相促进提供了经验。《书院文献总目》揭示藏馆和版本，大大提高了书目的质量和使用价值，《书院文献总目提要》本身便是研究成果，它不仅指引门径，也为进一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供了基

础和方便。而《中国书院志史》及其他研究论集，既是书院研究的新收获，也是书院研究深化的表现。他们的整理研究系列成果，不仅大大促进了书院研究自身的深入和发展，还旁涉中国古代政治史、经济史、教育史、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等各领域，从而也必将有利于上述领域的综合研究别开生面，以至进一步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其三，是大型专题资料丛书的新收获。大型专题资料丛书对于相关专题学术研究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新中国建立后，学术界一直有编纂大型专题资料丛书的传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史学会主持编纂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包括《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等十余种专题资料。这部近代史资料丛刊，成为中外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必读资料，也成就了一批国内外的教授、博士，产生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后，一些出版机构如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凤凰出版社等也组织或出版过许多大型专题资料丛书，一些专题档案也陆续刊布。专题资料丛书提供的材料比较全面、系统，使用方便，学者在比较研究中更易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也可以避免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弊端，故颇受学者欢迎。邓洪波教授主持的书院文献整理研究工作产生的几种大型资料丛书，是近年来专题资料丛书的新收获，也必将会为中国书院研究做出巨大贡献。

邓洪波教授是较早注意整理书院文献、研究中国书院的学者之一，也是当代中国书院研究的名家。数十年的潜心研究和执着追求，使他的研究成果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有很好的影响。现在他又主持完成了这样一件嘉惠学林的大功德，实在令人感动和钦佩，故不避浅陋而为之序，以表达对邓洪波教授及其团队学者的敬意。

杨忠（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大学教授）

2018年7月30日于北京大学蓝旗营

序 二

朱杰人

书院，是儒家文化特有的一种文化与教育现象。从唐代出现它的雏形开始，在长达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中它扮演着非常独特和重要的角色。

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与核心——儒学及其研究者、传播者——儒家的道场。书院是儒家的首创，在其发展过程中，成为儒学寄生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平台。所以，它的命运始终与儒学、与儒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儒学兴则书院盛，儒学衰则书院败。清末民初，废科举、办新学，书院也就走进了它的低谷。但是，历史总是爱和人类开玩笑，没有人会想到，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以后，书院竟然又焕然一新了。在新时代，它的勃兴居然如雨后春笋般“疯狂”与势不可挡。

书院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有官方和民间的双重性质，它既借助于体制的资源 and 模式，又有游离于体制之外的自由讲学和办学的精神，它一直被视为官方主流教育体制的一个补充、补缺。所谓“补充”，是说它弥补了体制内教育资源的不足，官学无法覆盖的，书院弥补了。所谓“补缺”，是说它补了体制内教育以应试（应科举）为目的之缺：书院教育以成人、成贤为目的，以传道（儒家的道统）为核心。实际上，从明代中后期以来，官学越来越流于形式，书院却以“补充”“补缺”之身而真正承担起国民教育的责任。放眼人类教育史，古今中外，中国的书院，恐怕是一种绝无仅有的与功利不搭或少搭的教育形态。而且这种与功利保持距离的教育形态在中国的民间一直很好地被呵护并发展着。书院的办学资金部分来源于官方的筹集，部分来源于民间的捐助，官员、商人、士绅是这种捐助的主体。中国的书院延绵千年之久，民间捐助者们的贡献居功至伟，官方的支持也是至关重要的。

正因为书院一定程度游离于体制之外，正因为它与功利保持距离，所以，能看到体制的弊端，能不受羁绊地思考与研究。于是，中国的书院成了生产新思想、新学术、新理论的工厂。而这些新思想、

新学术、新理论又对社会、人心产生了影响，从而影响了国家与社会的发展。

朱子是第一位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对中国书院的制度建设，理论建构，办学目标、方针、方法等做出重大贡献的学者。他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是一篇划时代的纲领性文献，为中国书院的建设与发展打下了基石。直到今天，这篇文献依然是新时代书院实践的“源头活水”。而他在岳麓书院的一系列教育实践，则为后人留下了健康与科学的教学与科研生态的典范。中国的书院之所以有着那么强劲的生命力和生机活泼的内生动能，不能不说与朱子有关。

中国书院在千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为记录其历史、教学、经济、学术、考课等，留下了数以万计的各种文献，包括书院记、书院志、学规、章程、课艺、讲义、会录、同门谱、藏书目录、刻书目录、山长志、学田志、日记等。这些文献不仅对研究书院至关重要，对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学术、政治等都具有不可取代和或缺的重要意义。遗憾的是，随着书院的没落，这些文献也随之散佚。国力的强盛与传统的复兴，终于使书院文献获得了一个新生的机会。邓洪波教授领衔的课题组发起对中国书院文献的整理，实在是一件对民族文化功德无量的好事。我参加了本课题的可行性论证，拜读了全部课题报告以后我意识到，这是一次全面的、系统的、全覆盖的整理，课题完成，也就意味着中国书院文献的集成。这是一件值得所有关注书院的学者们高兴和期待的学术盛事。

当然，讲到这件盛事就不能不讲到邓洪波教授。邓洪波教授并不是最早关注并研究中国书院的学者，但他却是一位始终不渝地专注于这个领域而默默耕耘的学者。他的可贵之处在于，当书院还处于一个被人遗忘和被绝大多数人冷落的年代，他始终没有放弃。他以一己之力，收罗钩沉、爬疏剔抉、考镜源流、排比论列，终成一家之说。现在书院研究成了显学，洪波并不被“显”而空疏、好高求远的世俗所裹挟，踏踏实实地做了大量的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工作。他的抱负和执着不能不令人感佩。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成果就要出版了，它包括书目、影印、点校、研究几个系列，这是一件盛事。洪波兄要我写一个序，但是我对书院没有研究，真是不知道这个序该从

何说起，只好谈谈自己对书院的一些基本认识，以塞文责，也算是不负洪波兄的一片美意。

朱杰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荣誉会长、中华朱子学会常务副会长）

2018年6月12日于海上桑榆匪晚斋

序 三

郭齐勇

吾友邓洪波教授是著名的书院研究专家，他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这个项目意义重大，洪波兄及他领导的团队视野宏阔，功底扎实，其成果将成为新一轮书院文化研究的新基础。

存世的中国古代书院文献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但分散于各处，经史子集四部都有，研究者难于查找。比如，一些书院讲义见于经部；一些书院志见于史部地理类“古迹”，书院藏书目录见于史部目录类“公藏”之属，书院碑记则多被收录进史部金石类“石类”之属；一些书院讲录、语录则被列入了子部儒家类；还有一些关于书院的记述，散见于集部的诗文集子之中。四库之外与四库之后还有不少有关书院的原始文献。此外，民国以来大量的书院研究文献散见于各种报刊。要把这些文献整理个头绪出来，殊非易事。

邓洪波教授很早就用心于书院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早在1997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陈谷嘉教授与他合著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书末有一个附录《中国书院文献书目提要》，共著录文献370余种，按省区编排，并作提要，是较早汇录书院文献提要的重要成果，实开撰写汇编书院文献提要的先河。此次以重大项目为契机，邓教授进一步扩大规模，对中国书院文献作穷尽性的整理。他立志“竭泽而渔”，把不为人知的书院资料最大限度地从“冷宫”中解放出来，摸清并亮出全部家底。

据课题组调查，历代书院专书（整本）文献总量近2000种，其中亡佚500种左右，存世1500种左右。通过检索、查阅等手段，课题组对存世的约1500种文献进行普查，对作者、版本、流传、体例等爬梳、董理，将编制成一部大型的《中国书院文献版本目录》。在此基础上，将选择较有价值的书院文献约1000种予以影印，汇为《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然后，选择其中有代表性的、意义重大或者较为少见的书院文献约150种作点校，做成《中国书院文献荟要》。除了对原始文

献进行整理，课题组还将对数量庞大的书院研究论著予以编目，著成《近百年书院研究论著目录》。如此大规模地对书院文献进行整理，在学界当属首次。除了大规模的文献整理，课题组还将在此基础上，陆续推出《中国书院志研究》《中国书院文献总目提要》《中国书院文献研究》等专题方面的系列研究成果。这些整理与研究，功德无量，必将嘉惠学林，促进书院历史与文化研究走向新的繁荣。

这些整理与研究，除了大有功于书院学的发展，我想对于古代儒家文化和思想的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书院是我国古代极为重要的教育机构，也是学术机构。而无论是书院的教育还是书院的学术，都与儒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我国古代众多的学术思想流派中，最重视教育的是儒家。孔子是我国最伟大的教育家。我国古代教育的内容和理念也主要是儒家的，从书院的学规就可以看出来。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影响后世书院办学数百年，大家耳熟能详，其中规定了书院的目标和学生的守则。它集儒家经典语句而成，便于记诵。它要求学生明白义理，并落实到身心修养上来，按学、问、思、辨、行的次第，格物致知、穷理尽性，最终实践笃行。由一代名臣张之洞于1869年创办的经心书院，于2015年在武昌东湖复办。在下忝为该书院名誉山长。我对这一书院提出了学规：以行己有耻、修身立德、知行合一为宗旨；以“五常”（仁义礼智信）和“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生的指南；以孝亲、守礼、笃学、敏行为条目（步骤）：孝亲——爱父母；守礼——懂规矩；笃学——读经典；敏行——做公益。座右铭：“儒有忠信以为甲冑，礼义以为干橜，戴仁而行，抱义而处”；“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书院运行一定要在这些义理的指导下进行。总体上是要贯彻孔孟仁义之道，提升办院者与学员的人文道德素养，身体力行，知行合一。

儒家不仅仅重视学校教育，同时也重视家庭与社会教育。社会教育是通过文化传播的方式实现社会教化。社会教化的基本内容和理念依然是儒家的。儒家之所以有那么强大的生命力，能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与它重视文化传播和社会教化是分不开的。两宋以来，历代大儒多依托书院面向社会大众从事讲学。他们的学术功底，他们的人格魅力，非一般教书匠可比。他们凭着学术思想和人格魅

力，所过之处，化民成俗，雅称“过化”。他们使得儒家理念在社会大众的日用伦常中生根发芽，从而使儒家思想落地，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古代儒释道三教相辅相成、相互支持，儒生书院也往往有赖于佛寺、道观而生存。

古代的书院是介于官学与私学之间的教育机构，是在致力于解决官学教育种种弊端的基础上产生的，它反对功利主义，反对仅仅把教育当作科举考试的手段，反对把教育仅变成记诵之学。书院的教育强调道德的修养和人格的养成。毫无疑问，这有赖于对儒家义理的讲明。在讲明儒家义理的过程中，书院的学术讨论形成了。所以，书院也是一个学术机构。书院里的学术讨论既服务于教育，亦致力于学术自身的发展。这里的学术主要还是儒家的。比如，南宋时期的湖湘学派是理学南传之后最先成熟起来的一个理学流派，而岳麓书院正是当时湖湘学派的基地。公元1167年，朱子不远千里从福建崇安赶到长沙，就是为了与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岳麓书院主教张栻讨论儒家理学上的一些问题，史称“朱张会讲”。朱张会讲开书院会讲之先河，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着重大的意义，为不同学派的争鸣，为书院成为儒家学术研究机构，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据邓洪波教授的统计和研究，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大大小小的书院7500余所。这些书院是中国文化与儒学教育、研究和传播的重要场所和基地，它们把传统文化与儒家思想带入了中国社会的各个层次和各个角落。它们自身亦成为儒家和儒学的载体，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

我们目前对于儒家思想文化，主要还是通过儒家的经典文本来了解它的思想理念，通过史书记载来了解它的社会影响，通过分析当时民间的思想观念来了解它的传统魅力。然而，我们对于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播过程和传统的形成，其实还停留在比较抽象的层面。现在，邓洪波教授开始了对书院的综合研究，无疑为我们了解这方面的情形打开了一扇大门，能极大地帮助我们深入而具体地了解书院的组织架构、制度、理念以及儒家思想文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所占有的地位，并了解儒家思想文化的世俗化过程和儒家传统的传承。对于书院文献的综合整理和研究，也有助于我们深入而具体地了解儒家思想文化对周边国家的传播过程。明代以后，中国书院这种教育组织形式，大量地传入东亚各国各地区，对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儒家文化圈的形成

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书院文献的内容相当丰富，借助这些文献，我们也能对历史上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有更加深入而具体的理解。

伴随着国学热，我国这一波书院热也持续十多年了。可以说，国学热在今天也表现为一定程度的书院热，各地的民间书院如雨后春笋般涌出。有人粗略估计，近几年全国出现了几千所书院，但良莠不齐，鱼龙混杂。正如我们对国学热予以肯定并提出批评一样，我们也对书院热予以肯定并提出批评。传统的书院，包括嵩阳书院等最有名的书院在内，现在一般只是文博单位，成为文物、博物馆或旅游景点，不再具有古代书院的职能。老书院焕发青春的唯一典范是岳麓书院，该院得天时、地利、人和，结合传统与现代，使千年书院获得新生。今天书院，就主办方而言，大体上有官办、商办、学者办、民办，或官学商、或官学、或商学、或民学合办等多种，但是由于历史经验不足，存在许多问题，还是要从传统书院吸收精神营养。而传统书院的办学经验、精神营养具体都有哪些，离不开对古代书院文献的深入研究。

可见，无论从传统还是从现代来看，中国书院文献的综合整理与研究都有着巨大的意义。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邓洪波教授身处岳麓书院，长期从事书院研究，并且有着亲身的体验，我们相信在他的主持下，这项整理与研究一定能结出硕果，一定能极大地推进书院学的研究，也一定能为儒家乃至整个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奠定新的基石。

是为序。

郭齐勇（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

2018年6月于武昌珞珈山麓